

文学的呼吸

——诺奖的回归*

〔法〕金丝燕

摘 要：和人类的生命一样，文学有为往昔的、为未来的和为今天的。和者众的属后一类；前两类和者寡。文学诺奖为今天的写作举起灯塔，顺应当世。无论波浪如何，自问世以来，不曾脱其轨。

关键词：文学诺奖 书写的双重镜像 现代性文学的要素

2022年文学诺奖获得者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1940—）为自传写作带来革命。其革命性在于书写的双重镜像：内在镜像和与之相应的一切外在镜像。在叙述者的内心镜中映射出社会与个人的细腻滚动，清晰地显现自我和与自我相连的六十余年法国社会镜像，这是一幅当代法国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如《悠悠岁月》[*Les Années*，2008]）。

文学诺奖一年一度掀波浪是它的呼吸节拍。其天性使然。

文学的呼吸在有文字或尚无文字的时候已经开始，无论空间、时间、人类脾气如何变幻，文学任性地顺和着自己，不论外在的节拍。吐纳若还要跟从社会的呼吸，文学早就死了，一如生命。

而文学诺奖似乎给世间每一个想发言者提供了做呼吸机的可能。瑞典学者2000年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就高行健的文学诺奖做讲座，提到了社会舆论者的这一自信：

* 此文原载《财经》2022年10月17日副刊，第88—91页。此次征得原刊同意后在此转发。作者对本次转发之文略作修改。

诺贝尔文学奖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五项诺贝尔奖中最受争议的。如果科学奖有时受到质疑，其争议也只局限在专家圈内，相反一旦涉及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上每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自认为有资格对此发表看法。瑞典学院所做的选择成为无穷无尽不同看法的话题。与此同时，似乎没有人能明确说出评审应遵循的标准。相比之下，科学文化有它的一致性，几乎游离于民族特征之外。医学或物理研究在全世界都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而且以同样的标准接受审定。然而文学，依赖于很难翻译的语言特性，而且通常植根于本土精神文化之中。诺贝尔文学奖是否会成为一个种族中心主义的奖？瑞典学院是否只把奖颁发给合欧洲口味甚至只合北欧口味的作品？这是近年来多次出现并被自称为后殖民思想的代表人物再次提出的尖锐批评。相反，物理、化学与医学奖大部分获奖者来自美国和欧洲这一情形则很少遭到批评。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存在“公平”的话，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人都应该享有科学发现所带来的进步。然而涉及文学，人们要求得更多。有一种观点希望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应该在地球上的人民之间、在男女性别之间更平等地分配。在这种观念下，作家被当成追逐金牌为其祖国增光的运动员。^①

文学和生命都是宇宙的幻现，它可以是云是冰，是水是海，是葡萄汁是空气是大雾，是露珠，是泪水，是水晶，如果它是水性。它可以是岩石是沙漠是土地是大理石，如果它是土性。它可以是星星是月亮是太阳是光是火，如果它是火性。它可以是微风龙卷风雷雨疯狂，如果它是风性。幻现是无尽头的，而人，对这些幻现的感觉是有限的，要看他的心力、维度。对于这些幻现的感应取决于感应的秉性，在这

① 引自贺拉斯·恩格道尔（Horace Engdahl，瑞典学院院士，1999年起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于2000年11月18日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讲演：《诺贝尔文学奖与一种世界文学的观念》，载《跨文化对话》第8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个有无数光点和光点之间的互相的多重的折射里，哪一个是真实的？哪一个能代表他者？不过感觉的感应而已，文学诺奖是这无穷感应点之一。宇宙的光点，有必要跟着这一个感应而转吗？

文学发着光点的折射，自在地呼吸，不在乎社会呼吸机群的交响乐。它跨越编年史和地理疆域：

伟大的作家有时是游牧族，很难按他们的国籍分类。^①

若言2022年文学诺奖获得者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是对抗社会与阶级的不平等，她以写作为刀，“撕开”社会的面纱，揭露真相，那只是批评者“以人生为文学”的社会现实主义逻辑的反应。把反叛作为现代性的依据或标志恐怕是世纪的大误解。至少从文学发展史上看是这样。现代性在文学中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温和的进程。它从文本开始，时间可以上溯到亚历山大图书馆时期。进程与进步不同。亚历山大图书馆时期，口头文学被梳理归类批注出版，写作成为个人叙述的一种方式，写作者的主体性也随之产生。我们可以借用西方的阅读经验。古希腊人不喜欢看书。他们的阅读活动就是听和讲，也就是口头叙述。诗歌是为朋友和情人们朗诵的。言说是有声的。单色写作成为个人叙述方式时，思想作为无声的心灵活动可以用无声的符号来传达，读和写互为关系形成了。无声的言说形式出现之后，叙述者一有声读者不再把声音借给话语，不再随时被规范的不属于任何人的话语所侵入，叙述者的自我意识，与语言的主次关系逐渐形成。

安妮·埃尔诺1940年9月1日出生于法国诺曼底（Normandie）的里尔堡（Lillebonne）。入私立天主教学校，初尝社会等级的势力。十八岁初次离家去夏令营打工，也初尝性果。她将这一经历写入《姑

^① 引自贺拉斯·恩格道尔于2000年11月18日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讲演：《诺贝尔文学奖与一种世界文学的观念》，载《跨文化对话》第8辑，第16页。

娘的回忆》(Mémoire de fille, 2016)。自那时起,安妮·埃尔诺开始写自传体小说。她的作品,始终不离法国自传传统,即个体写作带来新的阅读方式。

写作带来新阅读方式:个体阅读即反通识阅读。在远古的口头文学或言“前文学”时代,所有神话与叙述都在群体巨大的记忆库之中,通过表演来激活。每个人,无论叙述者还是听者,都借着群体的声音与记忆库相通。群体与个体的阅读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通识阅读与反通识阅读两种不同的行为,是表述与写作两种指向完全不同的期待。现代性文学的第一要素完成了。它的核心是“自我”主体写作。这一写作的形成过程在欧洲,从亚历山大图书馆时期到十六世纪前后,始于圣·奥古斯丁(Saint Austin, 354—430)、经法国的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经历了近两千年。

而在自我主导的写作中,又有“我思故我在”(笛卡尔,Descartes, 1596—1650)与“我思我不在、我在我不思”(拉康)的问题。首先,“我思”为“我在”提供存在的理由和条件。这是对异识最出色的总结。人从歌者的角色脱离,主体性创造文本。寻找未知的对话者,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其次,我思进一步变成我怀疑。这个“我”真能如此把握寻找和创造么?主体开始怀疑“我”作为主体的存在。我在与我思被分成两个不能同时进行的行为。就是把“我”思——文学的写,与我在——一个无法脱离文化群体的存在,这两者分开。

“我”不再是讲书人,事件的叙述者,他不面对听众,也没有活跃节日和社会气氛的任务。他只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沉寂中与他唯一的听众沉寂对话。写作变成进入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内在的记忆与外界的记忆融合。

法国从笛卡尔到二十世纪的拉康,自我从极度自信到开始裂变,这个阶段走了近四百年。从把创造性让位给词语的马拉美到尝试自动写作法的超现实主义、意识流碎片式写作的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拒绝现实描写的新小说派到今天的传记小说、社会问题

小说，西方文学不离两个因素：一，是起源于口语和交流而具有概念化游戏的字母文字；二，是古希腊史诗传统、历史叙述、自我书写始终或隐或现地主导着书写和阅读。

文学，无论怎样变化，不离三种态度：为昨天？为今天？为明天？当文学的书写含六大要素（文本、叙述角度、内在读者、时间、视角、语言），为内批评法、外批评法、总体批评法提供批评的借口，文学就制造接受视野。而其被接受的程度，要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公约数。

构成文学史的事件本身并不自动产生意义。意义是由写作者定义的。我们感兴趣的是正在写的历史：它为什么如此发生？为什么不能不如此发生？诚然，历史的假设是荒谬的。然而，历史，至少今天我们见到的历史，都是主观的证词。历史不过是一个文本。它的存在形式取决于人对它的诠释。而文学对于人类的力量，如果有的话，恐怕不是主义，而是文学的超越性。超越空间—国度、民族、文化的疆土，超越时间—历史进程、编年史和进步。在这一历史中，记忆是否必须是美好的，而遗忘一定与恶连在一起？或者相反？谈今天是为了更好地明白昨天还是为了掩盖昨天？在人类二十世纪的记忆受到质疑的时候，二十一世纪的记忆也不再单一地被接受。写作者与艺术家是人间少数有着清醒的头脑、试图独立于主流之外的人。他们使我们更敏感文学的存在，更试图接近自己。

当代文学有两大倾向：一是社会关系淡化出现的个人化，公民空间因此变得狭小，甚至破灭。出现的极端是群体社会解体后的个人孤独、痛苦。第二是共同价值消失，出现虚无主义，任何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价值而不用考虑他人的价值。而在很多情况下，批评并不以暴力出现。相反，是以依恋想象中的往昔这样的方式出现。

可以关注到，在这一股文学诺奖的波澜中，批评者的语言比作品更含暴力：

愤怒地描述、无知、肮脏、粗俗的醉酒顾客、粗暴的描述，令人震惊、平庸的主题、出身贫寒的父母、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充满失落、绝望、希冀、梦想的奋斗、极其痛苦和矛盾、爱恨交加、描述了羞耻、羞辱、嫉妒、困境……

文学作品就是如此为人们提供言说的可能和批评的借口。

安妮·埃尔诺的近20部作品将个人的记忆与叙述的记忆在镜中融合，生命继续，镜像继续，叙述继续，叙述的时间和空间继续。读者和批评者因其生命的触点——性别、语言、社会阶层、理念的不同，各自按图索骥，超越可能的强烈差异而感受亲切。

安妮·埃尔诺的“有距离的写作”（L'écriture de la distance），不离自然主义写作和“零度写作”传统，只是书写的角度由对外转向，以内为镜，书写镜像，一种特殊的内外透视法。她的作品，从最初的《空柜子》（*Les armoires vides*, 1974）、《地方》（*La Place*）和《一个女人》（*Une femme*, 1988）、《简单的激情》（*Passion simple*, 1992），到《姑娘的回忆》（*Mémoire de fille*, 2016），其中《冰冻的女子》（*La Femme gelée*, 1981）的叙述者是文学老师，与一位公务员结婚，有两个孩子。在这理想的生活后面，透着社会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紧张度。《位置》（*La Place*, 1984）是“有距离写作”即无表情写作的佳品。小说写主人公对幼时家庭社会地位的观察。2000年的《事件》（*L'Événement*）忠实记录了作者自己在姑娘时堕胎碰到的困苦。

她的作品在文学的六要素、内外批评、历史的记忆和内在的记忆和叙述的记忆的结合上达到的公约数比较大。从文本到文本互涉性（文本），从经验性个体到自我的主体性（叙述身份），从记述真实到真实记述（时间），从自我的主体性写作到词语的创造性（内在读者），从词语创造性到词语的解构（写作语言），从词语的创造性到自我的分裂（视角），安妮·埃尔诺忠实地处于当代文学构成的主脉。或许因为如此，法国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忠实地履行其对文学家的特殊

的战略：物色、支持一个作家，从最初的作品开始，大胆“期货”。因此，初为中学老师、后在一个远程教育中心工作的安妮·埃尔诺的作品全部由加里玛出版。

这是真正的现代性写作。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其产生与写作者的“主观”意识有直接关系。这一角度同时涉及文学发展和文学观念两个方面的研究，从叙述的角度寻找叙述主体。这个主体是如何擅入到写作之中并使文学具有现代意义的呢？现代性文学来自自我，文学的主观性并不指作者在作品中感情的倾泻，个性、观点的表述。也就是说，不是社会性的自我。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而是指体现在作品中的一种写作意识。法国当代学者米歇尔·冉刻（Michel Zink）认为，只是在作品创作意识这个意义上，叙述者的主观性确定了文学的产生。这一意义上的文学，它不再义务承担为外界提供政治军事历史与感性信息，不再为自诩为客观真实的世界而存在，不再为玄学或神圣的真理服务。只有当它作为特殊的意识状态，往来于个人主观意识与语言表达形式之间的时候才可能存在。^①

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是当代社会史诗，其长河般的喃喃细语是典型的“有距离书写”，本质上是一种“瑜伽”写作，身心合一，智性和内心的流动在外部世界的镜子无数光点互为折射，中性，纯白，不满足于再现胃肠气。那是文学长河中的一股水流，各种心性都可以在岸边高举路标或任意加入其中从容咀嚼。

安妮·埃尔诺的保持距离是在直白而毫不妥协的书写上，而在现实中，她继承法国作家的“介入”文学传统。她对妇女的社会生存状况、社会事件诸如“黄马甲”运动、新冠疫情的防护政策和法国极左派的活动都保持发声。近日也听到她的感言：“获奖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责任，是诺贝尔奖赋予我的责任。这是为了见证……一种与世界有关的公平、正义的形式。”（瑞典电视台SVT）

^① 参见 Michel Zink, *La subjectivité littéraire*, Paris: PUF, 1985, pp.8-10.

安妮·埃尔诺的书写是纯文学的，是人生文学的水晶折射，是为今天写作的极品。

和人类的生命一样，文学有为往昔的、为未来的和为今天的。和者众的属后一类；前两类和者寡。文学诺奖为今天的写作举起灯塔，顺应当世。无论波浪如何，自问世以来，不曾脱其轨。

至此，贺拉斯·恩格道尔关于诺奖的解谜可以有新的理解：

世界主义的内涵也许是诺贝尔遗嘱中那一段谜语般句子的真实含义：文学奖应颁发给“具有理想倾向的杰出作品”。^①

圣·奥古斯丁开始的“自我的文学”这条线上，一千七百年以来不曾脱过链。只要人在，它将继续。法国2022年的获诺奖女作家六十多年来走在这条大路上，和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叙述者们。文学诺奖的瑞典语颁奖词对此作出如下释义：“因为她以勇气和医术般的尖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陌生感和集体性的束缚。”

^① 引自贺拉斯·恩格道尔于2000年11月18日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讲演：《诺贝尔文学奖与一种世界文学的观念》，载《跨文化对话》第8辑，第15—21页。